

#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九十三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

## 當代中國大陸蒙古語言學文字學 研究概述

包力高 著

\* 係個人研究，不代表機關立場 \*

# 當代中國大陸蒙古 語言學文字學研究概述

## 一、蒙古語言文字研究史回顧

蒙古語文研究始於十三世紀中葉。遠在十七世紀，曾有過三部名爲《蒙文啓蒙》的語法著作，作者分別爲貢嘎堅贊（藏族）、擀思吉斡節兒和貢嘎斡節兒，但均已失傳。內蒙古察哈爾人貢嘎斡節爾著述的《蒙文啓蒙》，將蒙文字母表歸納爲108個音節字母，並將字母  $\text{ᠨ}$ 、 $\text{ᠭ}$ （n、g）前邊的識點去掉，而在字母  $\text{ᠬ}$ （q）的前邊加了兩個點，即與現代蒙文字母恰好相反。

十八世紀問世的兩部語法書是阿拉善人蘭占巴·丹津達格瓦的《蒙文啓蒙詮釋》和烏拉特人格西·畢力根達賴（又名夏拉布扎木楚）的《蒙文授業啓蒙》。前者主要介紹、注釋了擀思吉斡節兒《蒙文啓蒙》，再版多次，留傳至今。全書除題爲“祭言”的序，分爲“文字學”、“形態學”、“語音學”3個部分，以語音、拼寫法、語法爲主。《蒙文授業啓蒙》則是擀思吉斡節兒《蒙文啓蒙》的縮寫本。

1828年阿拉善的阿格旺丹達爾著《詳解蒙文文法》一書，對蒙古文的正字法、正音法作了詳細解釋。同年，西土

默特人嘎拉桑著的《蒙文詮釋》由北京嵩祝寺書社刊印出版。此書在蒙古語文的研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作者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第一次將蒙古書面語同口語區別開來作了比較研究，並提出了若干新見解。在蒙文正字法、正音法及語法、詞彙等方面也有較多新的論述、解釋。隨後，他又於1845年寫出了《增訂蒙文指要》一書，對敬齋公、富俊（八旗蒙古人）《三合便覽》的《蒙古指要》作了補充解釋，並使蒙古語、滿語名詞格的比較研究深入了一步。

1848年，賽慶阿的《蒙文指要》問世，其第三冊《蒙文法程》同滿語進行比較，研究了蒙古語的形態變化。書中還對蒙文正字法中連接元音規則的“不變字”作了研究。

1909年，嘎拉桑的學生都格爾扎布編撰了一部以正字法、正音法、語法、詞彙為主要內容的《蒙文要義大全》全書八冊，前六冊是蒙文正字法，以蒙漢兩種語文進行解釋。第七、八冊為滿譯蒙概述，對滿、蒙兩種語文的語法形態作了比較研究。

1924年，喀喇沁人特睦格圖、伊德欽編的《蒙文教科書》石印出版，是一部普及性教材。

1927年，蒙文書社出版了羅布桑確吉爾的以語音、正字法為主要內容的《蒙文要義明鑒》。該書在語音學方面認為蒙古語語音系統中具有區別詞義的長元音和短元音。對詞組和合成詞也作了很準確的解釋，還指出了前人未曾提到的蒙古語名詞的格。

1930年，興安第一國立高級中學（也稱開魯第一國高，按1930年係民國十九年，當年發生九一八事變之後設立偽滿

洲國，則該國立高級中學之國立，應指偽滿洲國而言——校訂者註）編印了《蒙古文字的起源》一書，首次區分了蒙古語名詞、動詞的構詞附加成分，並解釋了蒙古語名詞的格、反身變格、數等語法範疇。

1934年，出版了喀喇沁人汪翔高；（博彥畢勒格）撰著的《蒙文文法啓悟》一書，以正字法、語音、語法為主要內容將音節字母分解為音位字母，並對蒙文的格與一些小品詞的語法意義作了新的解釋。

1935年喀喇沁人都仍蒼編著的《蒙文課本》刊印，書中對蒙古語的元音、輔音等第一次作了科學定義。

1942年，開魯蒙文學會出版了額爾敦陶克陶的《蒙古語簡明語法》（也稱《蒙文新鑒》），敘述了蒙古文字的起源、蒙文字母表的發展演變、蒙古書面語與口語相脫離的現象，主張確定蒙古語標準音，並對蒙文字母表和正字法提出了具體改進意見。

此外，還有拉木蘇榮的《詳解蒙文文法金鑒》、獨貴的《心鑒序》、那順烏爾圖的《蒙文疑難問題解》、本圖的《蒙文啓蒙增補》、那欽的《蒙文注釋》、裕子書的《虛字歌》、羅力格爾扎布、和興格的《初學國文》、札木彥的《蒙文初學教程》等書，其內容與丹津達格瓦的《蒙文啓蒙全釋》大同小異。

1947年秋，內蒙古軍政大學成立了自治區第一個蒙古語文研究機構——蒙古語文研究室。這個研究室的清格爾泰、額爾敦陶克陶等編寫了蒙古語教材和詞典，還在呼倫貝爾地區進行過蒙古語調查。

1953年5月，在呼和浩特召開了內蒙古自治區首次蒙古語文工作會議，確定了加強蒙古語文工作的方針、政策，提出了蒙古語基礎方言、標準音問題。

五十年代，內蒙古師範學院、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內蒙古大學的先後建立，使蒙古語文研究工作者的隊伍進一步擴大。

從1947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語文研究工作尚處於起步階段。這期間共出版研究著作十餘部，發表論文近100篇，主要研究成果有：清格爾泰等合編的《現代蒙古語》（上、下兩冊，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是第一部運用現代語言學理論全面、系統地研究蒙古語文的著作。它包括語音學、語法學、句法學、詞彙學、詞源學、詞典學、文字學、修辭學、方言學、蒙古語族語言學及國內外蒙古語研究概況，現代蒙古語的發展與規範等多方面的內容，是六十年代大陸地區蒙古語言學研究的重大成果之一。

八十年代以後，蒙古語文研究走上了繁榮發展的道路。在各個研究領域都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研究機構、研究隊伍迅速發展壯大。在研究方法、研究手段方面，也在不斷更新。特別是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等單位運用電子計算機、方言地圖學等手段研究蒙古語，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同時，自治區各研究單位，同國內外蒙古學界進行了廣泛的學術交流活動，進一步提高了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語文研究水平。

## 二、蒙古語言文字學主要研究機構

### 1.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所：

五十年代，為系統地研究蒙古語言文學歷史，1953年5月22日，成立了“內蒙古蒙古語文研究會”。1955年7月22日，自治區政府成立了推行斯拉夫蒙文的內蒙古文字改革委員會。1957年5月22日，由該委員籌備成立了內蒙古歷史語言文學研究所；1957年10月，成立了中國科學院內蒙古分院，下設包括歷史語言文學研究所等的四個研究機構，1962年撤銷該分院建制，1958年3月19日，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通過決議，停止在內蒙古自治區推行斯拉夫蒙文，恢復學習使用了傳統蒙古文；並同時將內蒙古蒙古文字改革委員會改為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同內蒙古歷史語言文學研究所合署辦公。1958年12月，將內蒙古歷史語言文學研究所分為“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與“內蒙古歷史研究所”兩個研究單位。1964年，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劃歸內蒙古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領導。“文化大革命”期間，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被迫撤銷，1973年4月，該研究所雖然得到恢復，但由於各種干擾到1978年幾乎沒開展研究工作。1979年2月8日，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劃歸社科院領導，並分為“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所”和“文學研究所”兩個研究機構。

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所，內設語言、文字、修辭、詞典四個研究室和一個辦公室，共有科研人員11人，行政人員1人。其中，正研究員1人，副研究員7人，助理研究員3人。研究方向為：蒙古語言基礎理論和蒙古語言現狀問題研究，突出應用研究，為蒙古語言文字的規範化、標準化服務。八十

年代以來出版專著和工具書十四部、論文二四〇餘篇。主要學者有巴達榮嘎、昂日布、吳俊峰、諾爾金、圖力更、包力高、丹森、季榮等。

**2. 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1962年5月，內蒙古大學成立了蒙古語文研究室，與蒙古語言文學系合署辦公。1982年改名為蒙古語文研究所，內設詞典編纂室、滿通語研究室、計算機蒙古語文信息處理研究室、實驗語音室、圖書資料室、辦公室等機構。現代科研人員二十三人，行政管理人員一人。研究方向為：現代蒙古語研究，蒙古語族語言研究，中世紀蒙古語研究，蒙古語詞書編纂學研究，阿爾泰語系諸語言比較研究；蒙古語文信息處理研究、蒙古語方言學研究等。八十年代以來出版專著三十餘部，論文八〇〇餘篇。其中《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二十一部。主要學者有：清格爾泰、確精扎布、陳乃雄、包祥、新特克、白音朝克圖、呼格吉勒圖、賈拉森、恩和巴圖、哈斯巴特爾等。

**3. 內蒙古師範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1979年3月成立，在建所初期稱“內蒙古師範學院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1980年改名為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所，1983年9月將歷史研究室劃歸歷史系後，正式定為現在名稱。內設蒙古語言、蒙古文學兩個研究室、情報資料室、辦公室等，現有科研人員二十一人，其中管理人員二人。主要研究方向為：蒙古古典文學、現代文學、民間文學、民俗學、現代蒙古語及方言等。出版專著五十八部，發表論文五四八篇。主要學者有：巴雅爾、那仁巴圖、哈日夫、蘇古拉、納日蘇、扎格爾、特木爾巴根、呼和巴日斯等。

4. 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蒙古語言文學研究室：1979年成立蒙古語言文學歷史研究室，1984年改名為蒙古語言文學研究室，內設語言、文學兩個研究組，有科研人員九人，管理人員一人，研究方向為：科爾沁土語研究，科爾沁民間文學研究，民俗學研究，蒙古語文教學研究，主要學者有：特圖克、濤音、王頂柱等。

另外，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北京大學、黑龍江大學、吉林大學、遼寧大學、西北民族學院、青海民族學院、新疆大學、新疆師範大學、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等專門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都有人數不等的不同形式的蒙古語言文字學研究機構，二十年來，在科研與教學方面都有若干重要成果，現從事蒙古語言文字研究的專業隊伍有近五〇〇人。

此外，還有“中國蒙古語文學會”、“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中國民族語言學會”、“內蒙古語言學會”、“內蒙古翻譯協會”等若干群眾學術團體。這些團體在蒙古語言文字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貢獻。

1977年成立了包括全國的內蒙古、新疆、青海、甘肅、黑龍江、吉林、遼寧、北京八省區蒙古語文工作協作小組，該協作小組辦公室設在內蒙古呼和浩特，主持日常工作。上述每個省區都有各自的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由於加強了語文工作的領導，中國大陸的蒙古語文的規範化與標準化工作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 三、蒙古語語音學研究



二十年來，中國大陸蒙古語音學研究有了很大的發展，據不完全統計，自 1978 年以來，國內期刊上以蒙漢兩種文字發表的研究論文達 500 餘篇。這些論文大都採用描寫或比較的方法，對口語和書面語、現代語言和文獻語言、蒙古語和親屬語言的語音進行了歷時的和共時的探討。

元音的諧律，是蒙古語的一大語音特徵，多年來許多學者做了描寫研究。清格爾泰的《關於元音和諧律》一文達到了新理論高度。此外，喻世長的《元音和諧中的三足鼎立現象》、白音朝克圖的《元音和諧律的有關問題》和道布的《蒙古語的元音和諧與元音音位對立的中和》等論文都有較高的學術價值。這些文章，結合元音和諧律的研究，對蒙古語的語音系統、結構，尤其是對所謂“弱化元音”提出了新見解，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

對蒙古語“弱化元音”的研究，不僅在音位學方面具有理論意義，而且在正音、正字法方面具有實踐意義。多年來一些國家的蒙古語言學家認為“弱化元音”是相應短元音的音位變體。然而近年來以清格爾泰教授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蒙古語的“弱化元音”不能辨別詞義，只有組織語音作用（即構成音節）、其讀音是受元音和諧律和前面輔音制約的“依附元音”，它不是任何一個元音的音位變體。

結合蒙古書面語進行蒙古語音研究的主要作者有：包力高、滿達夫、雙福、諾爾金、烏恩奇、吉仁尼格、焦·吉仁尼格、白音朝克圖、吉爾班、達木丁、普爾布杰、包·吉仁尼格、烏力吉布仁、巴圖賽罕、金剛等。

結合古文字、歷史文獻和親屬語言進行語音史研究的論文

不斷湧現，極大地推進和提高了中國大陸蒙古語言的研究水平，獲得了各國蒙古語言學家的注目。首先在八思巴字研究方面，照那斯圖所取得的成就最為卓著。

在回鶻式蒙古文及語音史方面發表的論文有：亦鄰真的《畏吾體蒙文和古蒙古語語音》和《元代蒙語音譯漢字的慣例》，清格爾泰的《蒙古語塞音 q, k 的歷史演變》，喻世長的《〈蒙古秘史〉中圓唇元音的漢字表示法》，包力高的《蒙古書面語元音間未脫落的輔音一》和《關於蒙古語長元音的形成和發展》，武·呼格吉勒圖的《試論中世紀蒙古語元音 e 的音值》和《試論中世紀蒙古語的圓唇元音》，雙福的《試論古代蒙古語某些語音現象》、《關於中古蒙古語元音的音值》、《〈華夷譯語〉蒙古語元音結構及其特點》，巴雅爾的《關於〈蒙古秘史〉長元音的標音問題》和《關於〈蒙古秘史〉復元音的標音問題》，照那斯圖的《〈蒙古秘史〉漢譯本與八思巴字的關係問題》等。

結合親屬語言進行綜合語音研究的主要作者有：劉照雄、武·呼格吉勒圖、包力高等。這些論文採用描寫、統計和比較等多種研究方法，對蒙古語族諸語言的語音現貌和過去歷史進行了較全面的深入研究，為蒙古語族語言語音的系統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外，有關東鄉語的研究論文有：布和的《東鄉語的元音和諧律》和《關於東鄉語鼻輔音 n 和》，包力高的《東鄉語與蒙古書面語某些元音的對應》和《關於東鄉語的弱化元音》，那德木德的《關於東鄉語元音》，阿·伊布拉黑麥的《關於東鄉語語音的幾個問題》等。

中國大陸蒙古實驗語音學研究自五十年代以後一直處於停

滯狀態。確精扎布教授 1988 年在日本講學期間，利用日本的設備同城生伯太郎先生合作做了一些研究。他回國後發表了《蒙古語察哈爾土語元音的實驗語音學研究》和《有關察哈爾土語復合元音的幾個問題》等論文。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已成立語音實驗室，配置了先進的電腦語圖儀等設備，在實驗語音學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四、蒙古語語法研究

據不完全統計，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在蒙古語語法研究方面有十多部專著出版發行。它們已成爲中等專業學校高等院校學生及研究生使用的教程。

這些語法著作由於服務對象不同，其深淺詳略程度也各有異。但是，從研究角度來看，可以代表現階段研究水平的清格爾泰教授的《現代蒙古語語法》（1980 年年）、那順巴雅爾教授等的《現代蒙古語》（1982 年）、確精扎布教授的《蒙古語語法研究》（1990 年）、納·格日勒圖副教授的《蒙古書面語語法研究》（1998 年）等。

《現代蒙古語語法》中，對現代蒙古語語法進行了全面深入研究，進一步提高了中國大陸的蒙古語語法研究水平。例如，關於“格”的部分中，全面詳細地論述了蒙古語“格”的作用和意義。該書把句法的分析和“構詞法”作爲獨立的章節進行研究，是其特點之一。

《現代蒙古語》是由高等院校教授蒙古語的教師集體編著的。它是繼 1964 年出版的《現代蒙古語》之後，又一部較完

整的蒙古語語法教材。

該書取得的成績仍然是顯而易見的，尤其是句法部分提出了許多新觀點，是一部成功的學術著作。

《蒙古語語法研究》是作者多年來從事語法研究和語法教學的總結。作者為提高蒙古語語法研究的質量，以近五十年來出版的各種語法著作作為研究對象從學術方面進行了比較研究。綜述了前人研究的成果，修正錯誤和解決疑難，對不同方法和觀點進行了分析，強調了用數量分析語法現象，這是其突出特點。

此外，據不完全統計，此間發表了二〇〇餘篇論文，其特點是：

1. **提出了新觀點。**如達瓦達格巴的關於蒙古語的《插入定語》的論文，在語法結構上有著自己的特點，明確了這種現象不僅是在詞組內，也可以在句子中出現，並把它稱為“中加成分”。侯萬庄的《試論蒙古語替補成分》，提出了蒙古語除了有主語、定語、賓語、狀語、謂語之外，還有第六成分——替補成分的新見解。特圖格的《在蒙古語句法研究中運用定義法》的論文，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2. **運用了新方法。**在運用新方法研究蒙古語方面，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清格爾泰教授的關於分析句子結構的新方法。他從理論上總結出多層次分析方法論，並提出新的圖解法。在運用新技術方面，確精扎布教授利用計算機語言說明了“名詞主要充當主語、賓語，不符合蒙古語的實際。按其用法的次數，名詞主要充當賓

語、定語和主語”。

3. **重視了句法學研究**。近年來，以句法學為專題的論文發表了數十篇。其論題廣度、研究水平比過去有了顯著提高。論文涉及到了句法學的所有問題。包括句子結構、句子分析法、複合句、詞組、不完全句、單詞句、句子成分等。

## 五、蒙古語詞彙學研究

二十年來，中國大陸蒙古語詞彙研究中取得的成果，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點：

1. 在綜合研究蒙古語詞彙方面，首先應該提到的是新特克的《現代蒙古語詞彙學綱要》（講義，1980年），這是中國大陸最早的詞彙研究專著。在這部著作中對詞的性質作了廣泛解釋，認為詞義性質及其關係是一個整體，並對其在詞和詞彙的蒙古語構造中所占的實際地位作了新的重要闡述，它是中國大陸蒙古語研究生詞彙課的主要教材。其次是1986年由內蒙古社會科學院集體編寫的《現代蒙古語研究概論》。這部著作解釋了語義學理論的某些問題，並把原來的詞彙研究分成詞彙和語義研究兩個部分，這是它的一個特徵。1988年出版了巴特爾的《蒙古語詞彙研究》。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正式出版的蒙古語詞彙研究專著。作者把詞的搭配這一內容包括在詞彙研究之中的新看法是新鮮的、獨特的。

## 2. 中國大陸蒙古語詞彙研究發表論文四〇〇多篇。其特點是：

在詞彙成分研究中，令人感興趣的是方言詞彙成分。五十年代對於中國大陸蒙古語方言曾進行了兩次普查，發表了若干論文，揭示了方言詞彙特點及這些方言對於豐富蒙古語詞彙所起的作用等。詞彙成分研究的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對於詞彙的基本成分進行了詳細的分類研究。

對於詞彙構造的研究，原來是在詞法研究中進行，現在則開始在詞彙研究中進行研究。

在詞義研究方面，關於詞義、詞彙內詞義之間關係的論文比較重要。其中有：《蒙古語語義系統的探討》（新特克）、《蒙古語詞的多義和詞義之間的關係》（何蓮喜）、《試論蒙古語相同詞和近義詞》（策·普爾布）等論文。

詞源的研究，近年來有的學者開始進行研究，但從發表的論文來看，主要是為解釋某些特別詞的來源而作了努力。例如：關於“成吉思”、“蒙古”詞的來源，發表了許多有不同看法的論文。同時，也有考證“察哈爾”、“滿洲里”“鄂倫春”等某些地方、民族名稱來歷的論文。除此以外，還有《蒙古語一些詞根來歷研究》（巴圖賽汗）等數篇論文。

## 3. 詞典編纂學的研究：

進入八十年代以來，在詞典學普通理論研究、詞典類型的劃分、詞典編纂經驗總結等方面，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著，詞典學理論水平提高到了一個新階段。

已出版的語文詞典有：

《蒙古語基本詞簡明注釋詞典》，伯·達木丁（已故）編（1988），《蒙古語學生詞典》，拉西東日布等編（1988），《蒙古語派生詞倒排詞典》，達·巴特爾編（1988），《蒙古語虛詞詞典》，巴·旺楚克編，《蒙古語比喻詞典》，色·蘇雅拉圖編（1989），《蒙古語標準音詞典》，內蒙古教育出版社編（1989）、《蒙古語成語簡略詞典》，哈斯額爾敦、烏·那仁巴圖、丹森編（1981），《蒙古語詞根詞典》，斯欽朝克圖編（1988）、《漢蒙詞典》，吳俊峰編（1983），《文學傷口簡略詞典》，阿·烏爾圖那蘇圖編（1989），《語言學名詞釋義》，那·官其格蘇榮編（1986），《心理學詞典》，扎巴編（1989），《教育學簡略詞典》，敖拉同志編（1987），《蒙古民族文藝作品形象薈萃》，德斯來扎布、呼木吉勒圖、敖特根等編（1988），《中國歷史上的部落和部族名稱解釋詞典》，道·索德那木編（1987），《國內外文學名著描寫典範詞典》（上下兩冊），額爾敦德巴根蒙譯。還有額敦桑布等編纂的《蒙古醫學詞典》，布林特古斯等的《蒙古風俗百科辭典》等。

#### 4. 新詞術語研究：

八十年代以來，內蒙古名詞術語研究及審訂工作，從組織建設、審訂統一標準化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

術語學是一門綜合了信息科學和語言學的專門研究概念定名的獨立學科。二十年來，研究和審訂了哲學、文藝、法律、教育心理、語言、歷史、地理、體育、生物學等十餘種名詞術語匯編或詞典達十五萬條左右。在高等學校蒙文教材

編委會組織下進行了十幾次名詞術語學術討論會，解決了部分新的名詞術語問題，其中特別組織討論了難度較大的有機化學的蒙語命名課題。上述這些彙編及詞典大都已出版發行。名詞術語的系列化工程的進展及其成果的應用，對整個社會文化教育，特別對高校蒙文教材的建設起到了很大的推動和促進作用。

蒙古語名詞術語創制和審訂的原則應體現名詞術語的民族性、科學性、國際性和穩定性這四大原則。這四大原則是蒙古語名詞術語的指導理論。

## 六、蒙古語方言學研究

1953年召開的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次蒙古語文工作會議上，首次提出了蒙古語基礎方言、標準音問題，但是當時並沒有開展方言研究工作。

1952年，北京大學受中國科學院的委託主辦了語文工作者培訓班，培養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語言研究工作人員。1953年起，中央民族學院語文（現已改為中央民族大學，以下皆同一——校訂者註）系開辦了民族語文研究班，培養了一批專業人才。1954年，內蒙古的一部分語文工作者參加了這個語文研究班。

### 1. 方言調查情況

1955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北京大學和內蒙古自治區的有關部門共同組織了由六十個人組成的蒙古語族語言蒙古語方言調查隊，內分十三小組，從1955



年6月末到9月末分赴內蒙古自治區的各旗和其他省區的旗縣，選定30個調查點，對蒙古語的方言進行了詳細調查，之後每個組都寫了調查報告，在此基礎上寫出了調查隊的調查報告。

1956年6月到1957年1月期間，中央和內蒙古的有關部門共同組織了由70餘人組成的蒙古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方言調查隊，從蒙古族居住的旗縣選擇了二十六個調查點，調查了蒙古語方言。

1959年中國科學院少數民族語言研究所、內蒙古語文研究所、內蒙古大學和內蒙古師範學院等單位，參照前幾次的調查報告，在1955和1956年的調查材料的基礎上，作了補充調查，寫出了統一的《蒙古語方言調查報告》。

1978年6月，由內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內蒙古語言文學研究所、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學院（今師範大學）以及蒙文專科學校的部分同仁組成標準音研究小組到錫盟正藍旗（錫盟係指錫林郭勒盟），對某些語音現象作了短期調查。

1980年7月至11月期間，由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的部分教師、研究生組成的語言調查隊，分七個小組分別對達斡爾語、東鄉語、保安語、土族語和東部裕固語以及蒙古語的衛拉特方言、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進行了調查。

## 2. 科研成果

清格爾泰教授根據1955年和1956年的方言調查材料，撰寫了題為《中國蒙古語族語言及其方言概述》一文，闡述了中國大陸蒙古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方言的總的情況。在這篇

論文中，作者對蒙古語族語言蒙古語方言區的人數及其分布情況以及各方言的語音、語法、詞彙特點進行了介紹。

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編著的《現代蒙古語》（1964年）一書的“緒論”部分中，對中國大陸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的情況同樣進行了系統地介紹。

清格爾泰教授在1959年發表了《蒙古語巴林土語的語音與詞法》；確精扎布教授1959年發表了《衛拉特方言的語音系統》；哈斯額爾敦教授1959年發表了《鄂爾多斯土語的特點》；白音朝克圖教授1962年發表了《巴林、察哈爾兩個土語的前化元音》。

對蒙古語族語言和蒙古語方言進行普查後，根據調查資料將大陸蒙古語方言劃分為五個方言：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內有新巴爾虎、陳巴爾虎、布利亞特三個土語）；東部方言（內有昭烏達、哲里本、卓索圖三個土語）；中部方言（內有錫林郭勒、察哈爾、鄂爾多斯三個土語）；西部方言（內有阿拉善、青海等土語）；衛拉特方言（未分土語）。

1959年的調查報告中，將蒙古語的方言也劃分為五個基本方言。不同的是把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改稱為東北方言，衛拉特方言改稱為西北方言。

在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學系編著的《現代蒙古語》一書中，對大陸蒙古語方言進行研究後，將後來劃分的五個方言改劃為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衛拉特方言、內蒙古方言等三大方言。在內蒙古方言裏又分為科爾沁土語、喀喇沁土語、巴林土語、錫林郭勒—烏藍察布土語、鄂爾多斯土語、阿拉善—額濟納土語等六個土語。

1960年在正藍旗和巴林右旗的小學搞過試點工作。在此基礎上，自治區語文工作委員會於1962年曾做出過以“正一巴語音”為標準音的決定。

內蒙古大學蒙古語言文學係從1959年起開設了《方言學概論》課程。這表明大陸方言學理論和方言研究方法已經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

八十年代初期，在對蒙古語方言進行多次調查的基礎上，發表了許多研究著述。

關於語言地理學研究：語言地理學研究，也叫方言地理學研究。中國大陸的方言研究目前還是以描寫方言學為主，同時人們也不同程度的採用著方言比較研究方法，尤其是歷史比較研究方法。在這種情況下，清格爾泰教授撰寫了《關於蒙古學研究中使用地圖方法的問題》（1985）一文，文中首先介紹了十九世紀末德國的溫克，法國的J.日葉龍、J.埃德蒙等人在方言研究中率先採用地圖表示法的情況，其次略述了在他們之後在許多國家盛行方言地理學的情形，並附上地圖說明了法、德、英、日等國的學者用地圖表示具體語言現象的做法。文中最後提出了在蒙古學研究中採用地圖方法的重要性。

關於方言劃分：內蒙古自治區蒙古語文工作委員會於1978年組織召開了由自治區直屬機關部分人員參加的關於蒙古語基礎方言、標準音問題學術討論會，就蒙古語方言劃分問題提出了各種意見：

五分法：哈斯額爾敦、那仁巴圖將中國蒙古語方言劃分為五個方言：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或東北方言；

科爾沁喇沁巴林方言或東部方言；中部方言（包括阿拉善額濟納）；鄂爾多斯方言或南部方言；衛拉特方言或西部方言。

四分法：滿達夫、阿拉坦巴根、吳俊峰將內蒙古語方言劃分為：東部方言；中部方言；東北部方言或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西部方言或衛拉特方言。

二分法：圖力更、孫竹劃分為西部方言（衛拉特方言）和東部（察哈爾）方言。其中孫竹將東部方言叫作內蒙古方言，把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作為內蒙古方言的次方言。

三法法：1957年，清格爾泰教授曾同意五分法，後來提出了三分法的意見。清格爾泰主編的《現代蒙古語》（1964年）一書，將蒙古語方言劃分為衛拉特方言、巴爾虎—布利亞特方言、內蒙古方言等三個方言，他在1978年撰寫的《中國蒙古語方言的劃分》一文中重新提出了三分法的意見，並從各方面作了詳細的闡述。現在多數人贊同他的三分法。

據不完全統計，這一時期刊布的論文和專著共達二〇〇多篇（部）。蒙古語的方言研究工作，獲得了豐碩的成果。

## 七、古代蒙古語研究

按照蒙古語的歷史發展，可以把它分為現代蒙古語和古代蒙古語。古代蒙古語的研究，對於揭示蒙古語言的歷史及其

發展規律，現代蒙古語及其方言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義。二十年來，在中國大陸廣泛開展古代蒙古語（主要是中世紀蒙古語）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績。

據不完全統計，二十年來，中國大陸公開刊物上發表的有關古代蒙古語研究的論文有二〇〇餘篇。這些論文的研究內容包括了古代蒙古語的各個組成部分。

在語音方面：《有關八思巴字母 e 的幾個問題》（照那斯圖）、《有關回鶻文字的幾個問題》（雙和爾）、《八思巴字》（包祥）、《元代蒙古語音譯漢字的慣例》（亦鄰真）、《有關和印度、藏文的關係的幾個問題》（賈拉森）、《中世紀蒙古語詞首[h]的來源及其演變原因》（巴音巴特爾）等；在語法方面的論文有：《〈蒙古秘史〉語言的數範疇》（確精扎布）、《蒙古語〈孝經〉的格》（哈斯額爾敦）。在詞彙方面的論文有：《海涅土〈蒙古秘史詞典〉勘誤》（額爾登泰、烏雲賚）、《蒙古語〈孝經〉及其詞彙初探》（哈斯額爾敦）、《〈華夷譯語〉蒙古語詞的回鶻蒙古文轉寫》（雙和爾）等，在綜合研究方面的論文有：《〈蒙古秘史〉原文考》（巴雅爾）、《回鶻蒙古文字研究概況》（道布）、《〈蒙古秘史〉畏吾體蒙古文復原》（亦鄰真）、《揚州元代牌子方塊和波斯文釋讀》（郝蘇民）《論阿拉伯文中世紀蒙古語文獻》（布和）、《八思巴字研究概況》（楊耐思、照那斯圖）、《〈蒙古秘史〉語言研究概況》（吉·吉仁尼格）、《關於〈高昌館課〉翻譯年代》（恩和巴特爾）等。

二十年來，出版古代蒙古語方面的著作有：

道布同志整理、轉寫、注釋的《回鶻式蒙古文文獻彙編》，照那斯圖、楊耐思編著的《蒙古字韻校本》（漢文），額爾登泰、烏雲達賚、阿薩拉圖所著的《〈蒙古秘史〉詞彙選釋》（漢文），郝蘇民翻譯、補注的《〈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漢文）。

《蒙古秘史》是蒙古民族的重要文化遺產，是蒙古族歷史、文學、語言等學科學術研究的重要文獻。額爾登泰、阿日達扎布還原注釋的《蒙古秘史》是用現代蒙古書面語轉寫的一部《蒙古秘史》。道潤梯步新譯簡注的《蒙古秘史》（漢文），對原漢文《蒙古秘史》進行了再翻譯。額爾登泰、烏雲達賚校勘的《蒙古秘史》（漢文），以顧廣圻本為底本，參照葉德輝本和錢大昕本以及其他有關資料，對漢字標音的蒙古語原文進行了勘誤，為《蒙古秘史》的語言和古代蒙古語研究提供了較為可靠的資料。此外都嘎爾扎布和滿倉用現代蒙古書面語轉寫的《蒙古秘史》，對古蒙古語研究，也很有價值。

包祥編著的《蒙古文字學》和包力高編著的《蒙古文字簡史》都提出和探討了蒙古古文字和古代蒙古語語音方面的一些問題。

照那斯圖的《論八思巴字》、《八思巴文元音字母字形問題上的兩種體系》、《八思巴字中的零聲母符號》、《〈蒙古秘史〉漢字音譯底本與八思巴字的關係問題》和《〈孝經〉蒙譯中的幾個問題》等論文，確精扎布教授組織研究生進行古蒙古語的研究，寫了一些有關蒙古語語法方面的論文。

## 八、蒙古語修辭學研究

在整個蒙古學研究中，蒙古語修辭學屬於新興學科。蒙古語修辭學研究起步晚，加之修辭學科本身的複雜性，比起其他蒙古學學科研究顯得比較落後。蒙古語修辭學研究雖已開展近四十年，但真正受到重視，並得以較深入地發展還僅僅是近二十年的事情。其主要特點為：

1. 研究成果增多、涉及範圍廣泛，這是前所沒有的。在蒙古語修辭學研究方面，公開發表了三十多篇論文、四部專著。論文，從不同角度涉及了蒙古語修辭學的許多基本理論問題，如蒙古語修辭學的學科性質、研究對象、對究範圍、任務，修辭學與其鄰近學科的關係，修辭學與語言學其他分科的關係，修辭學的特徵及其中心議題。此外，還涉及了蒙古語修辭手法。

烏·那仁巴圖的《蒙古語修辭學研究》一書是國內蒙古語研究領域中一部較系統而完整地論述蒙古語修辭學諸研究課題的學術專著。此書的出版填補了國內蒙古語修辭學研究領域的空白。為創立和完善真正的蒙古語修辭學理論體系開闢了新路。

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人員合著的《現代蒙古語研究概論》一書中的“蒙古語修辭學研究”一章，是副研究員蘇雅拉圖撰寫的。該作全面地總結了中國大陸蒙古語修辭學研究情況，肯定了成績，提出了存在的問題；針對中國大陸蒙古語修辭學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就澄清蒙古語修辭學

研究中的某些理論、概念、界限上的混亂現象，進行了較深刻的闡述；使用並提出了若干新概念、新術語。

此外，蘇雅拉圖編纂的《蒙古語比喻辭典》是國內第一部蒙古語修辭學辭典。該《辭典》動態地集中反映了蒙古語言修辭手法——比喻辭格的全貌，為蒙古學學者們研究蒙古語及其修辭，研究蒙古人的形象思維、美學、心理學、哲學、民俗學、文藝學等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資料。同時也為各階層廣大群眾閱讀、欣賞、借鑒蒙古語言的比喻手法和藝術語言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2. 基礎理論研究日趨成熟，研究方法有所更新並進一步科學化。學者們對修辭學的學科性質進行了深入研究。他們從修辭現象入手，並通過現象去深究修辭的本質，進而正確揭示出了修辭學科的純語言學性質。然而，研究並未停留在僅僅探索修辭學的學科性質這一問題本身，而是進一步深入考察了修辭學區別於其他語言學科的本質特徵問題，闡明了修辭學的綜合性特徵，這就為從正確角度出發來研究蒙古語修辭學奠定了可靠的理論基礎。

在此基礎上，學者們走出了以往那種只拘泥於簡單羅列修辭格式，簡單說明概念定義的粗略研究的窘境，開始注意理論研究，繼而湧現出不少探討純理論問題的文章。烏·那仁巴圖的《修辭不在蒙古語研究中的地位》一文，在立足於符號理論，探索蒙古語修辭學方面頗具啟發意義。作者在文中明確指出，修辭手法或方式本身是一個完整的符號體系，這一認識應該說是比較深刻的。其意義在於它把人們對修辭學



的一般認識提高到了一個理論高度，一改過去“修辭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錯誤認識，為修辭的“言傳”提供了理論依據。作者在文中通過比較分析修辭與語音系統，修辭與詞彙系統，修辭與句法系統，闡述了修辭並非語言單位的簡單重復，修辭與各語言單位只有一種獨特的對應關係，在語言情景或修辭語境中語言單位才有可能顯示其潛在的修辭價值或修辭職能的觀點，從而提出了修辭是作為人們交際工具——語言的生效符號系統的獨特見解。

隨著蒙古語修辭學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化，近年來圍繞修辭學在語言學中的任務問題出現了若干新提法、新觀點。在這方面，有的學者將語言學研究劃分為結構體系研究和功能體系研究這樣兩個相對應的研究體系，進而從語言的表達功能角度解釋修辭學在語言學中的任務，明確提出了提示語言運用規律是修辭學的任務的觀點。還提出“思想情感與表達，表達與效果”是修辭學中的中心議題之說。上述觀點的提出者認為所有的修辭現象繫於上述三者關係的主線上，修辭內容縱有千萬條，然則都是圍繞如何協調這三者關係而展開的。因此，連接“思想情感與表達，表達與效果”這三者關係的一條主線是修辭學的綱領。無疑這一觀點的提出不僅對蒙古語修辭學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而且對理論修辭學來說也具有廣泛的參考價值。

蒙古語修辭學研究的基本理論日趨成熟，體現在許多方面。除上所述，還有以下特點：重視了語言本身的其他諸要素；既考慮到修辭內容，又考慮到修辭形式；既考慮到語言結構，又考慮到語言功能；既考慮到語言，又考慮到言語；

既考慮到語言表達的主觀性，又考慮到表達效果的客觀性；既考慮到表達，又考慮到理解與欣賞；既考慮到語言的聚合關係，又考慮到語言的組合關係等。

蒙古語修辭學研究發展到今天，出現了一個從對修辭學現象的輕描淡寫走向一個專題一個專題地進行系統紮實研究的趨勢，出現了一個從靜態走向動態，從平面走向立體，從一元體走向多元體的研究趨勢。這一趨勢充分表明了蒙古語修辭學研究方法的更新和進一步科學化。

3. 蒙古語修辭學在研究、教學、應用方面均受到重視，專業隊伍也在壯大。從前對蒙古語修辭學進行專門系統研究的單位、部門和專業人員缺而又缺。到了八十年代初，隨著語言學界對現代語言學研究的重視，蒙古語修辭學研究也開始活躍起來。現在，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範大學、內蒙古教育學育、內蒙古民族師範學院、內蒙古蒙文專科學校、中央民族學院、西北民族學院等大學和一些中等專業學校都專門設置了蒙古語修辭學課程，並配備了專門教師講授蒙古語修辭學或專門研究蒙古語修辭學。此外，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等單位也都在專門研究蒙本語修辭學。

## 九、蒙古語族語言研究

蒙古語族語言中包括蒙古、達翰爾、土族、東鄉、保安、東部裕固、卡爾梅克（或作喀爾瑪克、喀爾穆克，要皆 Kalmak、Kalmuk、Kalmck 之諧譯——校訂者注）、布里亞

特、莫戈勒等九種語言。蒙古語族與突厥語族、滿洲通古斯語族合在一起，屬於一個更大的系屬—阿爾泰語系。分布在中國國內的蒙古語族語言除蒙古語外，還有達斡爾、土族、東鄉、保安、東部裕固等五種語言。

在中國大陸，對蒙古語以外的蒙古語族語言的正式研究，是從1955—1956年大陸範圍的蒙古語族語言方言普查開始的。十年動亂中，這項工作陷入完全停頓狀態。八十年代初，蒙古語族語言的科研工作得到了恢復和發展，二十年來，出版和發表了專著四十餘部，論文約二〇〇篇。

二十年來，先後出版了蒙古語族各語言《簡志》和《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兩套。蒙古語族各語言《簡志》是從五十年代中期以來陸續搜集語言材料，經過補充、核實、修改後，於1982—1983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除《蒙古語簡志》外有：照那斯圖編著的《土族語簡志》和《東部裕固語簡志》、仲素純編著的《達斡爾語簡志》、劉照雄編著的《東鄉語簡志》、布和、劉照雄編著的《保安語簡志》。語言簡志簡要地描寫了該語言的語音、語法、詞彙，並在每本簡志的附錄裏刊載了按統一大綱編寫的數百條單詞。其次，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是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結合建立蒙古語史課程和進行蒙古語族語言比較研究進而開拓阿爾泰語系語言比較研究的需要，按統一的計劃和要求編寫的。1980年6—10月，全所八名研究人員和十一名研究生分成七個小組，按統一的語言調查大綱，對大陸蒙古語族的達斡爾語、土族語、東鄉語、保安語、東部裕固語以及蒙古語巴爾虎布里亞特方言和衛拉特方言進行了一次

系統調查之後，各組分別編寫了三種資料：(1)調查報告，其中包括語音、語法；(2)詞彙集；(3)話語材料。在此基礎上，從1983年開始以《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的形成，陸續正式出版。現已出版發行完畢。這套叢書發行後，受到了國外蒙古語學界的重視。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別研究員栗林均得到這套叢書之後，以《東鄉語詞彙》和《東部裕固語詞彙》作底本，分別編寫和出版了《“東鄉語詞彙”蒙古文語索引》(1986)和《“東部裕固語詞彙”蒙古文語索引》(1987)。他在前一本書的序言中寫道：“這套蒙古語族語言方言研究叢書的公開發行，使包括中國國內孤立的蒙古語族諸語言在內的蒙古語族語言進入了可以進行真正的歷史比較研究的新階段”。這是“在蒙古語研史中應當特別予以記載的業績”。

拿木四來、哈斯額爾敦合著的《達斡爾語與蒙古語比較研究》(1983)就達斡爾語同蒙古語進行了平面比較。

喻世長的《論蒙古語族的形成和發展》(1983)是中國大陸出版的第一本關於蒙古語族語言歷史比較研究的著作。作者採用十幾條重要的語音、語法現象對蒙古語族九種語言的異同進行比較，構畫了從共同蒙古語分化演變為現代蒙古語族九種語言的進程。

二十年來所發表的學術論文大致可分為三類：

- (1)綜合介紹個別語言方言概況的論文有：那森柏、布和、陳乃雄、照那斯圖、李克郁、孫竹、馬國良、劉照雄等分別撰寫的《東鄉語概要》、《同仁保安話概要》、《土族語民和方言概述》、《達斡爾語概

要》、《東鄉語實詞及其形態》、《東鄉語研究》等。

(2) 研究探討個別語言中某些問題的專題論文：

關於達斡爾語。拿木四來、仲素純、恩和巴圖、森格、塔娜等發表文章，探討關於達斡爾語的領屬意義附加成分、謂語人稱範疇、親屬稱謂、元音和諧、語音系統、動詞的構詞附加成分、格附加成分、同音詞、漢語影響等問題。

恩和巴圖題為《關於達斡爾語歷史的幾個問題》的文章認為，《達斡爾語是包括在遼代或者比它還早的阿爾泰語系語言裏的古代語言方言之一。這種語言方言在某些方面與契丹語相近，而且同後來成了古蒙古語的那種語言方言，或者已經不為我們所知的某一種語言方言，也具有相當大的共性。這種語言方言或者其中的一部分，由於某種不太清楚的歷史原因，幾乎沒有經受突厥化。也沒有滲入外族語言，緩慢地獨立發展，而變成了今天的達斡爾語”。

關於土族語。李克郁、席元麟、季榮、清格爾泰等分別發表文章，對論關於土族語的 *nge* (*ge*) 的用法、詞彙的組成、構詞法、*i* : 、*a* 兩個動詞、*b* 音的發展變化等問題。

清格爾泰還發表討論土族語 *i* : ~ *a* 兩個助動詞的文章。作者指出，“我們在五十年代發現，土族語動詞後邊有 *i* : ~ *a* 附加成分的對立，如：*ni* ~ *na*，*dzi* : ~ *dza*……，在保安語、東部裕固語中也發現了類似現象。後來發現最能沒有矛盾地說明其性質的是表示主觀語氣與客觀語氣”。關於它的來源問題，作者將助詞 *i* : ~ *a* 與蒙古書面語的存在動詞

(a—)，(bü—)以及日語的存在動詞“aru”、“iru”的詞幹 a、i 聯繫起來進行了探討。

關於東鄉語。那森柏、布和、包力高、呼和巴爾斯、那德木德、阿·伊布拉黑麥等發表文章，探討了關於東鄉語詞的重音、人稱代詞、附加成分—mu、詞彙、元音和諧、輔音 n 和、復數附加成分—Giala、同源詞、元音、音位、構詞法、弱元音等問題。

東鄉族的阿·伊布拉黑麥幾年來研究探討本民族語言的語音問題，在他發表的《關於東鄉語語音的幾個問題》一文中，對東鄉語有關論著中的某些元音、輔音問題提出了不同見解。

關於保安語。劉照雄和林蓮雲在《民族語文》(1980.3)上發表題為《保安語和撒拉語裏的確定與非確定語氣》的文章，指出，“保安語裏助動詞大部分兩兩成對”。

陳乃雄發表的題為《保安語的數》的文章指出，“保安語年都乎土語的‘數’範疇中不但有單數、復數、中性數這樣三種形式，而且它的復數還可以分為大復數(—la)和小復數(—Gula)兩種。這是蒙古語族的其他任何語言‘數’範疇中所沒有的特殊現象”。此外，陳乃雄和勒·賽音額爾敦還分別發表過關於保安語的與蒙古語同源詞、名詞的概稱、形容詞的加強和減抑方法等文章。

關於東部裕固語。保朝魯在《關於東部裕固語動詞的式範疇》一文中，扼要介紹了東部裕固語的陳述式和祈使式的各種形式。作者認為，東部裕固語的陳述式形式—Gu/—g

(…)和形動詞形式—G(…)像是由中世紀的一gu/—kū分化演變而來的。而它的帶有一Gu附加成分的動詞謂語在形態、結構和意義上同中世紀蒙古語的一qu/kū形式的形動詞謂語相吻合。賈拉森的《東部裕固語的格和代詞的某些特點》一文，較全面地介紹了東部裕固語的格範疇及各類代詞。他在文章中提及過去中外學者未曾注意到的東部裕固語中的“方向格”和表示尊稱意義的第三人稱代詞ergen等問題。格日勒圖在《試論東部裕固語構詞附加成分》一文中，列舉了東部裕固語的八十多種構詞附加成分。

### (3)對語族語言進行比較研究

對語族語言進行描寫研究的同時，歷史比較研究也逐步展開。中國大陸蒙古語族語研究者，利用已經掌握的豐富的語言資料，分別從不同角度進行研究探索，發表的成果匯合在一起，幾乎將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首先有計劃地分頭撰寫論文的，是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研究所1981年畢業的九名研究生。他們的畢業論文分別以蒙古語族諸語言的基本元音、長元音和復元音、輔音、“數”範疇、“格”範疇、人稱代詞、後置詞、動詞的態、副動詞為題，進行了比較和探討。

語音方面：清格爾泰在《民族語文》(1985.3; 1989.1)上先後發表了《蒙古語塞音q、k的歷史演變》和《蒙古族語言中的音勢結構》兩篇文章，分別對蒙古語和東鄉語、土族語的輔音進行比較研究，深入探討蒙古語族語言當中實際存在的音勢結構(一個詞內輔音的配置規律)、對

應規律，為進一步研究語音演變史提供了重要線索。還有，包力高、呼格吉勒圖、孟和寶音、額爾敦朝格拉等分別發表文章闡述了語族語言與蒙古書面語的某些對應關係。

語法方面：陳乃雄的《蒙古語族語言祈使式動詞》以及森格的《蒙古語族語言動詞否定和禁止意義的表達方法及其特點》等，對於語族語言動詞的各種形態變化分別進行了比較研究。布和的《關於蒙古語族語言數詞的一些問題》一文，對於語族語言數詞的結構、數詞詞幹末的輔音 *n* 以及數詞受外族語言影響等問題進行比較和探討。王鵬林的《關於蒙古語族“格附加成分”的問題》和《蒙古語族“賓格附加成分”考察》，對蒙古語言學著作中一般所說的“格附加成分”提出異議。作者在上一篇文章中認為，蒙古語族語言的“格附加成分既跟單詞又跟短語發生語法關係，因此有理由把它們分析為句法關係的標誌——後置詞”。

詞彙比較方面：陳乃雄發表了《中國蒙古語族語言的構詞附加成分》和《蒙古語族語言的詞彙》。前一篇將除蒙古語以外的五種語言的二〇〇多種構詞附加成分匯集在一起，列舉接綴各種構詞附加成分的實例，供研究者參考。後一篇對語族語言的詞彙構成分別進行統計，並列表加以對比。其中本族語言的共同成分——同源詞在各語言詞彙中所占比例為：土族語名列第一（60.15%），東部裕固語第二（58.79%），達斡爾語第三（42.20%），東鄉語第四（32.89%），保安語第五（同仁方言，28.70%）。依照這個統計數字，就得重新考慮 1955—1956 年詞彙材料統計所表明的結果及過去人們一般所設想的達斡爾語與蒙古語共性最



大的看法。陳乃雄在這篇文章中，對契丹小字表示數詞的材料進行分析認為，可以證實“一般情況下，公元10世紀時的契丹語裏並不存在詞末n的問題”。契丹小字裏有作為“影子”字的帶點數詞與不帶點的數詞，“一數二形，不造二字而僅在一字上加綴附加符號以示區別，反映的很可能就是被今人稱之為‘不穩定n’或‘秘密n’的現象”。“蒙古語族語言詞幹末不定n之產生或許正始於這一時期，”布和在《數詞的一些問題》一文中也提出過類似的假說。

## 十、蒙古文字學研究

十三世紀以來，蒙古族使用的文字有回鶻文、回鶻式蒙古文、胡都木文、托忒文、瓦金德拉文、八思巴文、索永布文和基里爾文（或作息立爾文，俄文也採此項字母一一校訂者審註）等。用來記錄蒙古語或外來詞的音標有漢文、阿拉伯文、藏文、臥式方體字、滿文、阿里嘎里音標、拉丁音標和國際音標等。蒙古族在歷史上雖然使用了這麼多文字和音標，但是唯有在回鶻文的基礎上形成的回鶻式蒙古文和胡都木文在蒙古人中深深地紮了根，它們的生命力很強，使用的時間最長，通行範圍最廣，影響程度最大，它們以自己的優點戰勝了一個又一個複雜的文字，至今仍被使用著。蒙古族的許多文化遺產都是靠它們記錄、流傳下來的。在不同方言地區現在繼續使用的文字還有托忒文與基里爾文。繼續使用的音標有拉丁音標和國際音標。除此之外，蒙古族在歷史上曾經使用過的文字或音標同其所記錄的蒙古語文獻一起進入

了歷史博物館。作為蒙古族交際輔助工具的多種文字和音標，對蒙古族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教育的發展，以及對蒙古語的規範統一、豐富發展都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

自十八、十九世紀以來，我國陸續出現了一些蒙古語文研究著述，特別是進入二十世紀以後，蒙古語言文字的研究有了很大發展。對回鶻式蒙古文、八思巴文和托忒文都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至今在學術界還有若干問題沒得到解決，如對於回鶻式蒙古文何時在何種文字何種方言的基礎上創制的問題，及其文字體系反映了何種語音系統等問題均有不同的觀點。對這些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 1. 回鶻式蒙古文的研究概況

根據文字的演變特徵，我們將回鶻式蒙古文的發展過程分為如下三個階段：(1)“回鶻文”階段——自十三世紀初到十四世紀初，蒙古族原封不動地照搬回鶻文記錄了蒙古語，此間蒙古文的字母形狀讀音與書寫規則同回鶻文基本相同。(2)“回鶻式蒙古文”階段——從十四世紀初到十七世紀初，文字體系、書寫規則都發生了同回鶻文不同的變化，搠思吉斡節兒改進了回鶻文，使其進一步適應了蒙古語的特點，變成了蒙古族自己的文字。所以，有的外國學者將改進後的蒙古文也稱作“新蒙文”。(3)“胡都木蒙古文”階段——從十七世紀初至現在，文字體系、書寫規則等基本定型，被人們稱作“現行蒙古文”、“傳統蒙古文”、“舊蒙文”、“老蒙文”、“蒙古文”等。我們為使這個基本定型的蒙古文以有別於其以前兩個發展階段的蒙古文，採用了蒙古族西部地區

通用的名稱“胡都木文”（“胡都木”蒙古語詞意為“原有的、最初的”），它比較簡單明瞭，用起來方便。胡都木文同回鶻式蒙古文的顯著區別是：詞冠、詞尾的書寫形式不同，點點兒的規則變得較為明確，增添了借詞字母 f、z、c、k、h、lh 等。書寫規則也由過去的不穩定趨向定型化。

據記載，從十三至十七世紀出現了一些《蒙文啓蒙》之類的語法書。1243 年藏族喇嘛扎亞班迪達·貢嘎扎拉僧來到蒙古地區，為蒙古族創制了刮皮板形狀的文字。他還編寫了一部《蒙文啓蒙》，但至今我們還未見到此書。後來《也松格碑銘》出現後，才知道貢嘎扎拉僧創制蒙古文一說僅僅是個傳說。

十四世紀初語言學家搠思吉斡節兒編寫了一部《蒙文啓蒙》，書中總結了蒙古語基礎語法與正字規則，並整理出一二三個音節字母，對回鶻文的字母體系與正字規則作了若干改進。遺憾的是，這部《蒙文啓蒙》原本沒有流傳下來，我們只能間接地從十八世紀丹津達格瓦的《蒙文啓蒙注釋正字蒼天如意念珠》一書中了解搠思吉斡節兒〈蒙文啓蒙〉的大體內容。

到了十六世紀末期，為準確標記外來詞，1587 年喀喇沁的語言學家阿尤喜固什創制了“阿里嘎里”蒙文音標，它被經過長期使用，只有 f、c、z、k、h、lh 等字母保留下來，固定於當今的蒙文字母表之中。十七世紀初，在翻譯大藏經《甘珠爾》、《丹珠爾》的過程中，佛教僧語言學家貢嘎敖斯爾曾編著了一部《蒙文啓蒙》，但沒有流傳下來。

標記漢語借詞的另一個字母  $\mathcal{H}$  [ɔ] 出現於 1912 年喀喇

沁海出編纂的《五方元音》之中，至此便形成了由 31 個字母組成的基本型的現代的蒙古文——胡都木蒙古文字母表。

十九至二十世紀期間，還出現了一些蒙古語文研究著作，如阿格旺丹德爾的《詳解蒙古語文法》、嘎拉桑的《蒙文詮釋》、拉木蘇榮的《詳解蒙文文法金鑒》，羅力格爾扎布、賀興格的《初學國文》等，其主要內容為蒙古語基礎語法知識、正字法、正音規則和字母的演變等。

五十年代後，蒙古語文研究工作有了迅速的發展。清格爾泰教授於 1949 年編著出版了《蒙古語語法》一書。書中系統地論述了蒙古語基礎語法與蒙古文正字法。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教研室的《現代蒙古語》（上、下冊）等語法書中，詳略不同地敘述了蒙古文字的由來、演變及其正字正音法。進入七、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蒙古文字學的研究有了新進展，出現了幾部專著和數十篇論文。如包祥的《蒙古文字學》（1984），運用現代語言學的觀點，科學地闡述了蒙古文字及其產生、發展變化的規律。同時，在國內外首先提出回鶻式蒙古文使用年代的上限為十世紀左右的獨到見解，即《千年說》。鮑·包力高的《蒙古文字簡史》（1983），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利用有關中外文獻資料，對回鶻式蒙古文的產生、演變、發展和使用情況做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和介紹，並在其字形演變、古代讀音等方面闡述了自己的新見解。該書認為回鶻式蒙古文形成於十三世紀初，堅持了《八百年說》，認為中外有關記載是可信的，而《千年說》、《千年以上說》均屬推測之論，至今還未發現更為可靠的證據。道布的《回鶻式蒙古文彙編》中長篇導言認為，根據所

掌握的史料和現存文獻，判斷蒙古族使用回鶻式蒙古文是在公元1204年以後，同某些學者所做的推測形成鮮明對照。丹森的《蒙古文產生於何時的問題》認為回鶻式蒙古文是805—840或971—1125年間在回鶻文的基礎上形成的。1987年於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哈斯額爾敦、丹森等編著的《阿爾寨石窟回鶻蒙古文榜題研究》是一部新文獻著作，提出了新見解。1998年於內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頂柱的《蒙古文字史概述》一書。另外，新特克的《蒙古文正音法體系研究》、布和吉爾嘎拉的《回鶻式蒙古文及其正字法》、諾爾金的《蒙古文正字法總則》等論文，就蒙古文正字法、正音法方面存在的問題、正字正音原則、規範化的具體意見等進行了論述。

## 2. 關於回鶻式蒙古文的來源

### (1) 幾種不同的觀點

關於回鶻式蒙古文來源於何種文字何時創制的問題，在學術界有如下幾種不同的觀點：

- 1 藏族喇嘛貢嘎扎拉僧（1182—1251）於十三世紀中葉“為蒙古創制了文字”的傳說，今天已無人相信了。
- 2 起源於契丹小字說。有人曾認為遼王朝的契丹族同蒙古族同出一源，語言相近，均屬蒙古語族語言，推測回鶻式蒙古文是十世紀在契丹小字的基礎上創制的。但是據近年來契丹小字研究的新成果來看，契丹大字、小字都是源於漢文的特殊文字系統。契丹小字雖然是表音文字，但是其數量之多、寫法之

複雜同任何音位文字都是無法比擬的。所以“契丹小字說”也是不能成立的。

- 3 六至七世紀間，蒙古人與回鶻人同時借自粟特文之說。其根據是一些詞的寫法在回鶻文和蒙古文中雖然相同，可是在一些詞的第一音節裏只有蒙古語文才有元音，而回鶻語文卻無元音，因而有人認為這種不同的寫法不是接受回鶻文的影響形成的，而是直接來自粟特文。我們知道，粟特文是輔音文字，回鶻人借用粟特字母後，經過對粟特文的改造，使回鶻文有了元音字母。因而在轉寫梵文、粟特詞時，自然一些詞的音節都有了元音，蒙古語詞第一音節有元音存在，恰恰反映了它所接受的影響不是粟特文而是來自回鶻文。另外，回鶻式蒙古文的字母形體、書寫規則都幾乎同回鶻文完全相同，而不同於粟特文。所以，回鶻式蒙古文是六、七世紀時直接借於粟特文的說法難以使人信服。
- 4 認為回鶻式蒙古文來自回鶻文，但是創制的時間不是十三世紀，而是十世紀左右，即人們所說的“千年說”。其主要理由有二，一是回鶻式蒙古文在十三世紀初就已成了很成熟的文字，其書寫規則、文字體系都已定型。認為從1204年命塔塔統阿“教太子諸王以畏吾兒字書國言”到1225年《也松格碑銘》的二十年時間裏，如果是十三世紀初新創制的文字，無論如何也達不到《也松格碑銘》中蒙古文的那樣成熟程度。二是，如果認為回鶻式蒙古文

是十三世紀初創制的，那麼於 1269 年創制的八思巴文的基礎方言應該同回鶻式蒙古文一樣，但是，回鶻式蒙古文的詞首沒有輔音 *h*，長元音音組元音間有輔音  $\gamma \sim g$ 、*y*、*b*、*m* 等，而八思巴文卻同其相反，僅有詞首輔音 *h*，沒有上述元音間的  $\gamma \sim g$ 、*y*、*b*、*m*，同這些輔音相對應的只有一個  $\bar{h}$  (*h*)。這種區別無法解釋，回鶻式蒙古文是經過“突厥化”過程，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同回鶻人聯繫密切的地域同回鶻人相近的一個蒙古部落於十世紀時首先使用回鶻文記錄了蒙古語。

- 5 認為回鶻式蒙古文是十三世紀初在回鶻文字母的基礎上創制的。其根據如下：
- a. 普通文字學角度看，任何一種文字的產生或消失都是同其使用者的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宗教）密切相關的。蒙古汗國建立後，進行國家管理需要有條理的文書，蒙古族興起時，十三世紀初創制文字是一種政治歷史的客觀需求。
  - b. 中外文獻都比較一致地記載了蒙古族於十三世紀初在回鶻文字母的基礎上創制了蒙古文。

在南宋文人彭大雅、徐霆所著《黑鞮事略》中記有：“鞮尚考之，鞮人本無字書，然今之使用，則有三種：行於鞮人本國者，則只用小木。……小木即古木契也。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鎮海主之。……行於漢人、契丹、女真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刺楚材主之”。（移刺楚材按即耶律楚材——校訂者註）

1204年成吉思汗征服了乃蠻部，1206年建立了蒙古汗國。由於國家管理需要條理的文書，於是開始用回鶻文（也稱畏兀兒文）記錄了蒙古語。關於這個問題，在《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統阿傳》中有如下記載：“塔塔統阿，畏兀人也。性聰慧，善言論，深通本國文字。”從此，以回鶻文字母書寫的古代蒙古文便成了蒙古汗國的正式國文。

1344年（至正四年）色目人盛熙明以所著《法書考》八卷進呈順帝。（順帝乃明人所諡，北元則諡之為惠宗一一校訂者註）書中寫道：“惟我皇元，兆基朔方，俗尚簡古，刻木為信，猶結繩也。既而頗用北庭字（即回鶻字），書之羊革，猶竹簡也。”此記載同上述史料相吻合。

蒙古族最初使用回鶻文的情況還見十三世紀西方某些旅行家的“遊記”之中。

在1246年來蒙古汗國拜見貴由汗的意大利羅馬天主教徒普蘭·迦兒賓寫的《蒙古人的歷史》（又名《普蘭·迦兒賓行記》）中寫道：“成吉思汗征服了畏兀兒以後，採用了他們的文字，因為在此以前韃靼人（即蒙古人）還沒有任何文字；現在這種文字被稱為蒙古文。”1253年，法國羅馬天主教徒威廉·魯不魯克奉羅馬天主教皇英諾森四世和法蘭西國王路易九世之命，來蒙古傳教。在其“遊記”（亦稱《魯不魯克行記》）中寫道：“韃靼人使用畏兀兒字，自上而下書寫，又從上而下誦讀，一行一行從左往右……蒙馬汗（即元憲宗）寄來的蒙古語信函是用畏兀兒字書寫的”伊朗學者志費尼在其1253年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記有：成吉思汗“依據自己的想法，他給每個場合制定一條法令，給每個情



況制定一條律文；……因為韃靼人沒有自己的文字，他便下令蒙古兒童習寫畏吾文（即回鶻文），並把有關的札撒和法令記在卷帙上。這些卷帙，稱為“札撒大典”。上述中外史料互相印證，表明蒙古族於1204年以後在回鶻字母的基礎上創制了自己的文字——回鶻式蒙古文。

c. 古代蒙古族和回鶻族居住地域相鄰，在較長時間裏，互相有著廣泛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更重要的是，蒙古、回鶻兩種語言均屬類型相同的粘著語，在語音、語法、詞彙等方面彼此有著大量的共同成分。蒙古族當初全部照搬了回鶻文字母，經過近百年的使用之後，才捨棄了一個出現於詞尾的字母 z，這說明其餘二十個字母都適用於蒙古語，兩種語言的語音系統是很接近的。所以，使用回鶻字母標記蒙古語是很方便的。另外，在蒙古人採用回鶻字母之前，回鶻人使用這種字母已有數百年的歷史，在長期使用過程中，回鶻字母的用法逐漸走向定型，而且形成了一套比較成熟的書寫規則，這些都適用於蒙古語，用這套現成的字母和書寫規則記錄蒙古語，自然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而，這種被蒙古人使用之初的文字就給人以“成熟文字”的感覺是很自然的。

### 3. 關於基礎方言問題

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的創制時間僅相距七十年，我們認為二者都是在十三世紀合木黑蒙古語方言的基礎上形成的不同體系的文字。因而，這兩種文字反映的語音系統應該是一致的。那麼，二者為什麼在書面形式上表現得很不致呢？

1 符號體系不同，每種文字的繁簡程度不同。我們知道，回鶻文字母簡單含混，用十四、五個符號標記了

蒙古語的二十多個音位。有些字母卻有兩種以上的讀音。這些一字多音的字母，往往使人弄不清它究竟標的是什麼音，只有借助上下文或其它旁證材料才能大體上知道它應該讀什麼音。而八思巴文字母精細繁多，對個別音位變體也專設字母，給予精細地標記，所以一些外國學者說“八思巴文是元代的國際音標”。

- 2 回鶻式蒙古文歷史悠久，有些字母隨著語音變化而改變了讀音。字母“**𐰢**”《在中世紀蒙古語中讀 q、**ᠪ** (h)，使用文字之初仿照回鶻文的寫法在“**𐰢**”前加兩個點兒讀 q (**ᠪ**)，不加點兒的“**𐰢**”仍讀 **ᠪ** (h)。可是進入近代蒙古語階段，原來的 q 分化為 x、**ᠶ**，其字母形式為 **ᠶ** (x)、**ᠶ** (**ᠶ**)，而原來僅出現於元音間的“**𐰢**” **ᠪ** (h)，在口語中消失了，但是它在書面語中卻以不發音的“**ᠶ**”的形式被保留下來，由於它在書寫形式上同於由 q 分化出來的 **ᠶ**，所以人們就把書面語中早已消失的 **ᠪ** (h) 誤讀為現代蒙古語的 **ᠶ**。字母“**ᠶ**” (k > g · x) 出現於陰性詞中，其讀音的變化過程也類似上述 q。回鶻式蒙古文的詞冠也有很大變化，古時讀 a、e、h，現在僅讀作 e，因為詞首 h 在近代蒙古語中消失了。
- 3 回鶻式蒙古文（即古代蒙古書面語）元音間的 **ᠪ** 輔音，在陽性詞中用字母“**ᠶ**”，在陰性詞中用字母“**ᠶ**”表示，這個 **ᠶ** 在一些詞中又同輔音 b、y、m 交

替，因而在回鶻蒙古文中出現了用  $\pi$  ( ~  $\pi$  ) ·  $\phi$  ·  $\rho$  ·  $\sigma$  ·  $\tau$  等數個字母標記一個小舌濁擦音的現象。而在八思巴文中僅用了一個字母  $\rho$  (  $h$  ) 標記了中世紀蒙古語元音間的輔音  $\chi$ 。兩種文字中的這些差別都是由於文字體系的不同而產生的。

爲什麼說回鶻式蒙古文和八思巴文所反映的中世紀蒙古語的語音是一致的呢？

根據歷史學家們的研究，1204年成書的《蒙古秘史》最初是用回鶻式蒙古文撰寫的，原書後來失傳了，現存的本子是蒙古語的漢字音譯本。在蒙古高原，它的某種手抄本曾被保存下來，流傳了很久、現在雖然看不到傳抄本本身，但是在十七~十八世紀成書的羅布桑丹津《黃金史》中，可以看到其大約三分之二的移錄，據專家研究，《蒙古秘史》的漢文音譯本是在其成書七八十年後，由元仁宗（1311—1320）時的察罕完成的。我們從這個音譯本中可以看出，《蒙古秘史》的蒙古語音同八思巴文材料的蒙古語音是比較一致的。二者都有詞首輔音  $h$ ，這證明回鶻式蒙古文的詞冠符號“ $\pi$ ”原來的的主要讀音是  $h$ 。古代蒙古書面語元音間的  $\gamma$  ~  $g$ 、 $y$ 、 $b$ 、 $m$  在《蒙古秘史》中是以前後兩個元音連接的（但不是長元音）兩個以上漢字中間的輕微頓（即小舌濁擦音 ~  $h$ ）表示的。它同八思巴文材料元音間的字母所表示的語音是一致的。兩種文字其他字母的讀音大體上也一致。

在八思巴文和《蒙古秘史》中僅有輔音  $q$ ，而無輔音  $\chi$ （或  $G$ ），現代蒙古面語中的輔音  $\chi$  是從中世紀蒙古語輔音  $q$

中分化出來的（q > x、ɣ）。《穆卡迪瑪特阿拉—阿達布蒙古語詞典》中的數量很少，它也是 q 中分化出來的，因為它可以同 q 交替。所以，現代蒙古書面語（即胡都木蒙古文）元音間的 γ，在古代書面語中應讀作 q。

據中國大陸突厥學家的研究，在古代回鶻文獻中，僅用一個字母“𐰽”不加區別標記回鶻語的三個小舌輔音 q、x、ɣ。在稍後時期的文獻中，用前邊帶有兩個點兒的“𐰽”標記輔音 q，而用不帶點兒的“𐰽”繼續標記 x、ɣ。所以，我們認為古代蒙古書面語“𐰽”也應該讀作 q，它是用來標出一連串 a 中的 q，不帶點兒的元音間的“𐰽”應讀為（ɣ ~ h），這也說明回鶻式蒙古文同八思巴文所反映的中世紀蒙古語的語音系統是一致的。

### 三、其他文字的研究概況

1. 八思巴文的研究。八思巴文是十三世紀六十年代元世祖忽必烈特命國師八思巴在藏文字母的基礎上創制的一種拼音文字。它最初被忽必烈命名為“蒙古新字”，以後改名“蒙古字”，元末明初稱為“國字”。近代學術界通稱“八思巴字”、“八思巴文”或“八思巴蒙古字”，又稱“方體字”。

八思巴文 1269 年頒詔推行全國。隨著元朝的滅亡而逐漸被廢棄，然而，它留下書寫幾種語言的珍貴資料。

中國大陸對八思巴文的研究起步較晚，羅常培教授從三十年代末開始研究八思巴字，五十年代後與蔡美彪先生合編了《八思巴字與元代漢語》一書。進入八十年代後，中國大陸學者對八思巴文的研究達到了新水平。需要特別提出的是照

那斯圖先生在八思巴文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他是目前大陸研究八思巴文為數不多的專家之一。他的《元八思巴字篆書官印資料緝存》、《論八思巴字》、《八思巴字篆體字母研究》、《八思巴字研究概述》、（與楊耐思合寫）、《蒙古字韻校本》（與楊耐思合作）、《善說寶藏》（與斯欽朝克圖合作）等著述全面地論述了八思巴字的產生背景、字母來源、性質地位、體式類型和拼寫法等。特別是照那斯圖先生對八思巴文字母表的研究有新的突破，字母數目問題在學術界一直有分歧意見，曾有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五十一個字母的不同說法，照那斯圖先生經過對八思巴文資料的全面研究，歸納出五十六字母。並證明了八思巴字母表裏有表 p 的字母。照那斯圖先生的《八思巴字和蒙古語文獻》第一冊《研究文集》和第二冊《文獻匯集》於東京外國語大學分別於 1990 年、1991 年出版發行。該書不僅是八思巴字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且最全面地匯集了有關八思巴字的貢獻。1986 年內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郝蘇民先生翻譯補注的《〈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譯補》一書是鮑培先生所著《八思巴字蒙古語碑銘》的漢文翻譯補注本。

關於托忒文的研究。索永布文、瓦金德拉文、基里爾文以及作為音標使用的漢文、阿拉伯文、藏文、臥式方體字、滿文、朝鮮文、阿里嘎里音標、拉丁音標和國際音標等的研究或介紹，國內學者的意見比較一致，由於篇幅所限，這裏就不一一介紹了。

## 參考書目：

1. 烏力吉圖、吳金：《內蒙古社會科學通覽》，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2年。
2. 烏藍察夫、烏力吉圖：《蒙古學10年》，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
3. 額系德尼：《蒙古學論著索引》，遼寧民族出版社，1997年。
4. 清格爾泰：《現代蒙古語語法》，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
5. 包力高：《蒙古文字簡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年。
6. 清格爾泰：《語言文字論集》，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年。